

导语

：1927年8月1日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人民军队从此诞生。在南昌起义前后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对敌隐蔽斗争，为保证起义的成功发动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

1927年4月12日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。三天之内，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，500多人被捕，5000多人失踪，整个上海血雨腥风。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，被迫迁往武汉。

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，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中认

识到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党的安全成为最迫切的问题，要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，必须建立一个情报保卫工作的专业机构，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，及时了解、掌握敌人的军事、政治情报和警特机关动向，确保党有准备、有计划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。

1927年5月初，在周恩来的提议和具体组织下，一个全新的党的部门——特务工作处诞生了。周恩来把列宁创建“契卡”时所规定的“三项任务”和“一条原则”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，即打入敌内搜集情报；为地下党筹集经费；制裁叛徒和不准在党内搞互相侦察；赋予特务工作处从事情报、保卫的主要职责；在组织关系上隶属于中央军委，由周恩来直接领导。这是我党在中央层面创建的第一个情报保卫专业机构，是中央特科的前身。

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由顾顺章担任主任，下设四个股，分别是：情报股，负责搜集敌人情报，先后由董醒吾、李强负责；保卫股，负责保卫党中央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，负责人李剑如；特务股，负责惩办叛徒、奸细，兼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任务，负责人先后为张浩、李强；匪运股，负责联络帮会组织，收编土匪武装，负责人胡子。

特务工作处成立后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梅宝玢，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上层情报关系。他是武昌起义的元勋，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，因为夫人是日本人，他与国内军阀、政客和日本人交往很多，中央指派李强同志联系他，通过他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军政情报。

特务工作处的同志依靠工会的配合，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，为叶挺的部队搞到几十箱枪支；通过金融投资，为中央赚取了5万多元的活动经费；开辟了一条从汉口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；掌握了英商“祥泰木行”的运输船，后来中央的很多同志就是坐这条船到上海的。

1927年7月，苏联顾问鲍罗廷要回国。根据中央的指示，特务工作处精心挑选了30名保卫干部一路护送他，过河南，走陕西，经蒙古，最后安全到达莫斯科。这期间，特务工作处还动员了不少地方武装，加入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，为南昌起义积蓄了力量。



党中央之所以迁到武汉，主要是因为当时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尚未叛变革命，与我党仍然保持着合作关系，不少共产党员仍在他的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，有的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暴露，这就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党的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吴德峰，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局长，掌握着公安局的实权和警察大队等武装力量。吴德峰先后组织了党的“五大”和八七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，多次抓获了蒋介石派到武汉的密探和破坏分子。他还与陈公博等国民党汪系骨干分子保持着“密切”关系，及时获知了汪精卫的政治动向。

被誉为革命“五老”之一的吴玉章，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，汪精卫政府的一切重要电文都由他经管。1927年6月，他看到了冯玉祥发给汪精卫的一份电报，通报冯玉祥和蒋介石阴谋反共的情况。他立即向党中央做出了报告。

国民党内一些同情我党的左派人士，也积极向我党通报国民党反共的情况。1927年6月10日，冯玉祥同汪精卫、唐生智、谭延闿等在郑州秘密召开会议，策划反共。会后，与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派他的秘书将会议情况告诉了我党。6月19日，冯玉祥与蒋介石又在徐州举行会议，决定共同反共。7月14日，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集会议，担任国民党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排斥在外。深夜12时，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将会议情况告诉了吴玉章和林伯渠。7月15日，汪精卫公然宣布同我党决裂，叛变革命，大革命失败。

南昌起义前，特务工作处撤销了，所属大部分成员后来随党中央迁往上海。虽然它仅存在了三个多月，但是它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，在与汪精卫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帮助我党掌握了斗争主动权。



1927年7月12日，中共中央改组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张国焘、张太雷、李立三、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，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。为挽救中国革命，7月25日，临时中央做出了举行南昌武装起义的决定，由周恩来、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，周恩来任书记，具体筹划和组织起义的工作。

南昌起义前后，隐蔽在国民党内、尚未暴露身份的叶剑英、朱德、张云逸等中共革命的元勋，都为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，做了重要的掩护工作。

1927年7月上旬，经党中央批准，时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随后，他根据党的指示，密切关注汪精卫、张发奎等人的动向。7月28日，汪精卫召集孙科、张发奎、朱培德等国民党将领到庐山开会。会议决定：严令贺龙、叶挺限期率部队撤回九江，第二方面军全面实行“清共”，通缉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恽代英、廖乾五、高语罕等共产党员。叶剑英得知情况后，立即派人下山将情况通报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，廖又及时转告恽代英和高语罕。他们迅速离开九江，赶赴南昌向中共前委通报了情况。南昌起义发动后，叶剑

英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建议：如果尾追贺、叶，徒耗兵力，不如打起“援师讨逆”的旗号，直趋广州。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发奎的同意，从而使起义军减少了被大军追击的压力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。

朱德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入党的。1926年他回国后，党中央派他到南昌，利用与滇军旧部的关系，做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等滇军将领的工作。1927年初，朱德被朱培德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，并帮助朱培德筹建军官教育团。同年6月，朱培德将朱德礼送出境。南昌起义前夕，根据党的指示，朱德于7月21日秘密潜回南昌，参与了整个起义的安排，并指挥军官教育团做好起义准备。期间，朱德利用滇军内的关系，摸清了南昌市区内外敌人兵力部署的具体情况，绘制了包括敌碉堡、火力点在内的南昌市区地图，提交给了中央前委。7月31日下午，他按照前委的部署，邀请多名敌军团长吃饭、打牌，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后，朱德将他们全部抓起来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进行。



成立政治保卫处和公安局党



政治保卫处成立后，李立三率陈赓等人在南昌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，并且接管了江西省银行。南昌市公安局对原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队进行了整编，有秩序地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。

8月3日，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，中央前委开始率起义军撤离南昌，取道临川、宜黄、广昌，南下广东，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，占领出海口，取得国际援助。8

月5日，彭干臣在撤离南昌前，专门安排他的副官长唐天际留下来搜集敌人情况，配合部队转移。他还交给唐天际一个任务—设法与袁州的毛泽东及其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取得联系。但是，没等唐天际完成任务，敌军就攻占了南昌，唐天际在群众掩护下脱离了险境。

起义军南下途中，李立三率政治保卫处同沿途地方党组织及时取得联系，了解、掌握敌情，在广昌、瑞金、会昌、汀州、大埔、汕头等地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。由李鸣珂率领的警卫营则始终担负着保卫机关和首长安全的任务，他布置的李觉鸣、江海龙、李文贵等同志一刻不离周恩来，使抱病指挥部队的周恩来最终得以平安撤到香港。

南昌起义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期，成为人民解放军的起点。同时，南昌起义前后，我党开始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开展隐蔽斗争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培养了一批干部，为中央特科的成立和党的隐蔽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本文刊载于《炎黄春秋》2017年第8期

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